

华北敌后战场的小学“伪化”与“反伪化”斗争

徐传博

【摘要】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在华北敌后战场持续发动政治攻势,并加大对小学学生与教员的思想洗脑与政治控制,妄图使其服从日伪领导,是为小学“伪化”活动。部分学童受到蒙骗,沦为日本侵略者的马前卒。中共有针对性地完善教育系统、开展灵活教学,并加强对日伪小学学童与教员的政治争取,是为“反伪化”斗争。在中共的努力下,多数学童政治觉悟提高,广泛参与社会动员、社会教育、抗敌宣传工作,有的还投身抗日一线。“反伪化”取得重大成果,为中共日后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抗日战争;华北敌后战场;小学;反“伪化”

【作者简介】徐传博,男,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原文出处】《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24.3.68~79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在华北大搞“治安强化运动”以巩固统治,而“伪化”教育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日伪向沦陷区、游击区^①学生灌输亲日思想,并对教员威压控制,妄图使其屈服,成为日伪顺民。中共坚决予以反击,推进抗日教育,争取学生和教员,充实敌后抗战的群众基础。与中学、大学相比,小学是“伪化”教育的“重灾区”,也是“反伪化”教育的“重点区”,故本文着重阐述华北敌后战场的小学“伪化”与“反伪化”斗争。

小学的“伪化”与“反伪化”斗争并不如同一时期的军事斗争,有明确的时间节点与阶段性特征,但大体可以1941、1943年为节点分期。1941年以前为前期,学校遭日伪军事破坏,中共推动学校重建,“伪化”活动泛滥。1941-1943年是中期,日伪推行亲日教育并控制教员,中共则推进抗敌教育并争取学生教员参与抗日,“伪化”与“反伪化”斗争陷入胶着状态。1943-1945年是后期,游击区与敌占区多数小学为中共所争取掌握,多数学生与教员受动员参与抗战活动,“反伪化”斗争取得重大成果。需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伪化”不完全等于“宣抚”,两者虽有交集,且常相伴施行,但“宣抚”针对全体民众,手段多为拉拢怀柔;“伪化”则多针对学生与教员,手段是怀

柔与威压并举(“宣抚”是“伪化”的一部分)。二是“伪化”不完全同于“奴化”。两者亦有交集,但“奴化”是日伪洗脑中国人民的法西斯殖民地教育,多在敌占区;而“伪化”是日伪以洗脑、收买、整肃、镇压等多重手段(“奴化”是“伪化”的手段之一),妄图使学生与教员服从日伪控制的政治攻势与政治动员行为,多在游击区与敌占区。敌后战场有三类小学,即中共控制的抗日小学、日伪控制的伪新民小学与介于两者之间多由原私塾发展而来的“中间小学”。中共与日伪均意图在巩固对己方小学控制的同时,争取对方小学和“中间小学”服从己方的领导和管理,故小学的“伪化”与“反伪化”斗争多体现为双方围绕敌后战场小学实际领导权的政治博弈与争夺。

“伪化”概念内涵丰富,学界有关“伪化”与“反伪化”的研究亦经历了长期过程。20世纪末,与此相关的研究尝试有二:一是根据地教育建设,二是日伪“奴化”与根据地“反奴化”教育,均为初始的概况性研究。^②进入21世纪的头十年,抗日根据地教育建设方面的研究减少,开始出现对“奴化”教育的个案分析,并有了以杂牌军“伪化”为主题的研究。^③2010年以后,抗日根据地教育建设方面的研究有所发展,出现了对日伪“奴化”教育政策策划与实施过程的分

析,并有了以日伪“宣抚工作”为主题的研究。^④前辈学者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既有研究还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和不足,比如有关抗日根据地教育建设的研究多叙述教育体制机制沿革,“奴化”与“反奴化”研究多聚焦教育内容与方法、手段,二者均未突破教育工作的范畴,而“伪化”研究亦未拓展,并未涉及教育领域的“伪化”与“反伪化”斗争。且上述研究多依赖中文史料,缺少日文资料的佐证与中日史料的互证。可见,“伪化”与“反伪化”斗争问题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伪化”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一环,“反伪化”斗争是中共敌后抗日运动的重要内容,故研究“伪化”与“反伪化”斗争有利于全面地把握日伪侵略与中共抗战的基本内容。本文希望以中、日文史料论述“伪化”与“反伪化”斗争的内容、影响,揭示中共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

一、日伪的小学“伪化”活动

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伴随着“治安强化运动”的展开,日军持续加大“伪化”活动力度,其手段主要有军事破坏、思想洗脑与政治控制等。日军的军事破坏活动多为破坏学校设施、捕杀学生与教员,晋察冀根据地原有小学在抗战初被日伪摧毁殆尽。^⑤与此同时,日军也不断加大思想洗脑与政治控制的力度。

“伪化”活动的重点是小学,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小学生心智单纯,易被哄骗。日军认为,成年民众易因战争惧怕日本兵,但小孩却可被“皇军之温情”“感化”^⑥,故宜“利用(学童尚处)启蒙期,宣说抗日毫无意义,共产思想与中国精神悖逆”^⑦,麻痹学童抗战意志。二是中国传统家庭重视亲子之情,掌握小孩亦可对其父母施加影响。“即使视日军为鬼子的中国父母,眼见日兵爱护自己孩童之事,也必然生起好感”^⑧,故“需利用小学生教育波及其家庭”^⑨，“通过儿童可轻易把握民众之心理”^⑩。三是着眼长期侵略意图,谋划控制中国下一代,以待其成年后成为“亲日派”。日军认为“若培育纯一无杂念之童心”^⑪，“待当下儿童达到成年期后,(中日间)真正之合作亦为可能”^⑫。故日军认定,从孩童入手实施思想洗脑与政治控制是“最大捷径”。^⑬

在思想洗脑上,日军竭力推行“体现王道”、实行反共“新民主主义”的所谓“新民教育”。日军强令各地小学复课、学童复学。每到一处,必命调查当地学童人数,并遣汉奸翻译遍查各家,责令儿童到伪新民小学(以下简称“伪小学”)就学。^⑭或役使伪政府调查户籍,逐户动员儿童到伪小学就学。^⑮为便于就近控制,日军又大搞“集中小学”,即在其控制据点和村庄内集中新建伪小学,并实施“大乡”活动,调查登记适龄儿童,又强令各村派学童到据点村或岗楼内的“集中小学”内就学,其余外围地区小学则一律取缔。^⑯日军费尽心机网罗学童,如博望县某村,因不给送学童,日伪便强行没收各家锅具,并叫嚣“送几个学生来,才能把锅领回去”。此外,日伪还强迫小学教员到据点受训,并充任伪小学教员。^⑰

伪小学授课贯以“新民课本”美化日军侵略罪行,并以日语教育鼓吹中日“亲善”。日伪不断组织编写宣扬“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新民课本”,日军宣抚班也编制日语教科书、反共读本等,一同配发各小学使用。^⑱限于部分地区的印制与配发能力,日军也常沿用旧私塾的四书五经课本,妄图以“弘扬东洋文化”“尊奉孔孟之教”之名,行遏制抗日思想传播之实。^⑲总体来看,日军控制的县城附近多使用伪教材,距县城较远处则多“普及四书五经之类”。^⑳伪小学大搞“亲日教育”,常集合学童教员灌输“防共亲日”思想,^㉑日军守备队长每周也到校进行“亲日教育”训话。^㉒课上不允许讲中国历史地理,却大谈日本“明治维新”过程,还悬挂日本国旗,组织学童合唱日本国歌。^㉓日军认为,“学习他国语言,易对他国抱有兴趣,增进对他国的理解”^㉔,故伪小学课程多以日语为主。如在山西运城伪小学课程中,与日本相关课程的授课时间占总体授课时间的六成,其中日语课时间又占四成。^㉕日军还与伪小学共同组织文娱活动,制造“亲日”氛围。如募集中日儿童书画作品举行展览会,邀请各小学青少年训练团员参观;^㉖或教日本歌曲,与日本儿童交换书画^㉗、做游戏等^㉘,试图以此淡化和磨灭中国学童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

日伪还加大对“新民教育”授课的监督力度。日伪特务常搞突击审查,甚至以小股部队袭扰各村小

学,还时常派员在各村流动巡查。^②日军警备队多次召集村长与教员,申明严禁“排日教育”,强令实施“亲日防共教育”,并要求采用“防共读本”或旧私塾教材;警备队则任命“宣抚将校”“巡视各村加以监督”,还委任“特别巡查将校”来“监督指导”。^③日伪还遣人常驻学校监督,有的学校以警备队队长为顾问,另遣日军将校或下士军官为“宣抚官”常驻学校。^④在一些地方,日军派汉奸充任教员,甚至亲自操刀,任用有教学经验的士兵在闲暇时协助开展日语教学;^⑤或由警备队派有文化的下士军官充任日语教员,汉语教员则由受过教育、得到各村村长保证并通过警备队考察的“亲日教育家”充当。^⑥

在政治控制上,日军贯以小恩小惠收买学童人心。日军认为,“最有效”的手段是分发点心和小物件。^⑦在一些地方,驻防日军常集合附近村庄的学童听留声机,或发放装有文具、点心、仁丹、膏药、绘画书的慰问袋。^⑧每周“卫生日”时,向学童发放肥皂,组织他们到附近小河清洗身体。^⑨或开车接送学童参加观摩会,或发给旅费强迫学童去平津等地参观。^⑩或以日本儿童名义,赠送中国学童糖果玩具,或在广播电台举行中日儿童交流,或设置免费学额,鼓吹“奖助清寒学生,无力向学者得遂入学之愿”。^⑪

日军也不忘以利益收买教员,如提高教员工资等^⑫,但鉴于教员受抗日思想影响的风险较大,故以整肃为主。为此,日军相继成立“教员指导讲习会”等组织强迫教员加入,并强令各村教员每周到日军驻地参加“共同教育”,又令所谓“优秀教员”每月或每两月入城接受进一步培训。^⑬在一些地方,日伪每逢周日便召集县内教员入城培训,灌输“新民主主义”,实施日语教育,并举行测试以进行“思想检查指导”。^⑭有的地方还组织集训,如在延庆,日伪每年暑假必集中教员入城集训,或十天或半月,由日本人上课灌输奴化思想。^⑮日军常在训练班中发展特务,派汉奸学童监视教员言行,或检验学童思想以审查教员的教学工作。^⑯一些地方甚至还设立了专门负责“监督指导”教员的“日本督学官”。^⑰

日伪的思想洗脑与政治控制使敌后抗日教育工作遭遇极大挫折,部分抗日小学与“中间小学”蜕变为伪小学。伪“维新课本”“国定课本”在敌后战场的

小学中大为泛滥,日伪的小恩小惠使部分学童受到蒙骗,因而对日军“感恩戴德”。日军记述称,当地儿童“待我态度如慈父”^⑱。丰宁、滦平一带儿童皆知“日满一体”,十几岁的学生不知有祖国,甚至说中日战争乃“大日本皇军为‘正义’来打蒋政权与共产党”。^⑲据涞源城关解放后的测验,20个小学生中竟有3人称自己是日本人。^⑳学童家长和亲属也被蒙蔽,对日军产生好感,“经由孩童争取其父母、兄弟姐妹,卓有成效”^㉑,“学生的亲戚兄弟也成了亲日人士”^㉒。“对儿童教育的(影响)亦可波及其家庭”^㉓,部分民众“偶尔还会到访守备队,慰问日军官兵”^㉔,“宿营地内军民一团和气”^㉕。日军认为,日语教育“成果良好”,极大地促进了“中日亲善”,对“确立亲日排共思想的贡献不可估量”^㉖,日语学校对“提升治安(水平)有重大效果”^㉗。

部分学童受日军思想荼毒,甘愿为日军做仆从,沦为小汉奸。日军行军时,“小孩最先跑过来,为其带路并进行翻译”^㉘。日军甚至抽调日语较好的学童为代用翻译,随同参与侵略行动。日军评价称,学童翻译是“极为便利(获取)的珍宝,其效用极大”^㉙。日军设立的北平“日华学园”之类的儿童学校,旨在“培养优秀的翻译员、密探、马夫、牧夫等军属人员”^㉚,有的学童甚至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甘愿做日本侵华的马前卒。如雄县某完小240名学生中竟有230人加入伪特务组织“忠勇团”^㉛,部分学童还加入了日伪“青少年团”,“其成绩胜强于保卫团”。^㉜

二、中共的小学“反伪化”斗争

针对日伪的军事破坏、思想洗脑与政治控制活动,中共有针对性地实行了三项反击措施,包括完善教育系统、开展灵活教学与加强政治争取,是为“反伪化”斗争。起初因日军疯狂实施军事破坏,故中共大力实施重建与完善教育系统的工作。

完善教育系统的内容有三:一是重启教学工作,二是新建管理机制,三是新订抗日教材。在经费异常紧张的情况下,中共投入大笔资金重建小学校舍,号召学童与教员复课,并将学校改组为“抗日小学”,在教学中宣传抗战必胜。为保证大部分学童就学,中共颁布了强制入学命令,同时为减轻学童家庭的经济负担,还“实施免费教育奖励,开辟贫困子弟入

学之路,并努力奖励学龄儿童就学”^④,包括为学童提供免费宿舍、教材,并每月发放1—2元津贴。^⑤日军评价称,这足以体现中共“在重大困苦中,推进抗战建国教育”一事。^⑥中共还狠抓师资建设,除动员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充任教员外,还强化对教员的技能培养。中共中央发文指示,各地需开办教员训练班或讲习所,并在中心地区设立师范学校,训练培养小学教员。^⑦如山东根据地要求,动员在农村的原有教员、知识分子、私塾先生和敌占区知识青年,开办师资训练班、短期师范班,举行教员资格鉴定,还要求半数以上的教员接受半个月以上的训练。^⑧冀鲁豫分局也实施了小学教员轮训制。^⑨

新建严密的管理机制是完善教育系统工作的重点。1939年后日军政治控制力度的加大,使中共深刻认识到加强小学组织动员工作的重要性。旧中国小学教育体制涣散,学校各自为政,缺少对敌工作的统一领导,因而给了日军笼络并控制小学学童与教员的可乘之机。鉴于此,中共中央于1940年发文要求,每村需建一个初级小学,每乡建一个中心小学,每区建一个两级小学或完全小学,形成小学网。^⑩“以中心小学兼管乡村教育行政”^⑪，“以中心小学带动一般小学,开展教育辅导,提高教学质量”^⑫。中心小学可对周边普通小学实施“指导、监督和勉励”，“明确各校工作状况与困难问题,共同谋划改进”，“使各项教育工作与战争实际相适应”；中心教学教员可给予普通小学教员“进修教育及时事问题讲解”。^⑬县教育主管部门对各校“随时进行巡回监督指导”，学校每月上报报告,主管部门“依据报告及巡视结果区别各校工作优劣”。^⑭行政运行上，“一切决定事项,先传达至区政府及区高级小学,再由其立刻传达至中心小学,中心小学再立刻传达至所属各小学”^⑮。

中共很清楚,伪课本的长期泛滥势必毒害学童心灵,旧有课本充斥着四书五经等封建内容,也无法满足抗战的迫切需要。故中共在严令禁止边区小学使用伪课本的同时,也加紧组织人力编写新课本。因各个地区的条件与需求不同,课本并没有统一版本,但大多注重宣传抗日思想,介绍抗战相关的政治常识。日军调查称,中共课本着重“痛斥日本侵略,

呼吁国共合作,宣扬中国共产党之爱国态度……比较日支经济力、国土大小和与第三国关系,高唱长期抗战之必胜”^⑯。中共还督促各校改革授课内容,增加政治教育相关课程授课时间,缩减其余文化教育授课时间,其中“救亡常识”“救亡歌曲”占比很大,体育课完全改成军事教育^⑰，“废除非急需或不必要的课程……讲授抗日或作战上必要的课程”^⑱。

在完善教育系统的基础上,中共也有条不紊地开展灵活教学工作,其中有“游击教学”“两面教学”、隐蔽教学等模式。面对日伪的大规模袭扰与“肃正”活动,如何维护稳定的授课环境是敌后战场小学教育面临的重大难题。中共考虑到,如延续旧有固定集中的教学模式,则易遭日伪势力干扰和影响,故将学童队伍化整为零,分队流动开展教学,这便是融合游击战术精髓而成的“游击教学”模式。“游击教学”奉行“敌来听课,敌走上课”^⑲的原则,上课地点四周布置联络哨、通讯网,日伪未出动时实施集体教学,日伪一旦出动即行分散,由小组长组织教学,待日伪返回再复课。^⑳该教学模式有利于缩小学校目标,降低学校与学童遭遇敌伪破坏和捕杀的风险,被广泛应用于游击区距日伪据点较远的区域。

中共亦认识到,如学童常处于游击流动中,势必对教学质量造成不利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中央指示推广“小先生制”^㉑,选拔学童中的优秀分子担任“小先生”,协助教员指导学童学习,保证授课进度。一般按年级将学童分成若干组,每组有学童充任的组长(即“小先生”)一人,组长先受教于教员,再教育该组学生。教员不在时,由组长负责督促本组学童学习。^㉒此外还实施分队教学,学生不离本村,教员轮流到各村授课,在甲村上课时,乙村由成绩较好的“小先生”带领自学,或由教员解答后再传于其他学童。^㉓同时,还组建儿童团,作为“党和政府在国民教育方面的第一个助手”^㉔。儿童团常巡视各小组,随时向教员汇报上课情况,传达教员信息,并站岗放哨,保证学童安全。^㉕

“小先生制”与儿童团的结合,使得小组授课质量与安全均得到提升和保障。学习小组“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神出鬼没,常在距敌较近处等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展开秘密教学^㉖,游击教学的效能得到极

大发挥。日军在研究后也肯定了二者在游击教学中的重大意义,并将其视为中共小学“教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⑧他们认为,中共尝试选拔优秀儿童任“小先生”可谓“建立组织教育的初步(基础)”,组建儿童团则有助于“强化教育与抗战的一元化风气”。^⑨“游击教学”是中共敌后战场应用最多的教学工作方法。

在游击区距日伪据点较近的地方,因日伪封锁极为严密,较难保证游击教学的安全;或有的地方敌我争夺较激烈,形势严峻,从事游击教学比较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实施“两面教学”就显得很有必要,其学校称为“两面小学”。两面小学常伪装成伪小学,如迎门挂孔子像,墙壁贴“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之类标语,书桌上放伪课本。^⑩日伪教育视察员来时,即拿出四书五经或日伪课本予以应付,视察员一走,便又换上抗日课本。^⑪如敌人监视较严,则只晚上用抗战教材,或将学生带到野外授课。^⑫为防走漏风声,让低年级大声念书唱歌,以掩护中高年级上抗日课;或给中高年级学童上抗日课,低年级只学识字。^⑬该法在敌占区亦有应用,多教伪课本,但相机加以“批判教学,予以揭穿和消毒”^⑭。

在部分距敌较近地区或敌伪常巡查的小学,则实施更为隐秘的“隐蔽教学”,其学校称为“隐蔽小学”。上课地点多在学生家中或地堡、地道内,且事前并不通知第二天授课地点。每日放学后,教员仅告知组长(即“小先生”)次日上课地点,由其于次日带其他学生赶来上课。同时,严密岗哨,力求安全。有的地方还将此法与地道战术结合,实行“洞口教学”,在有洞口的屋内上课,一有敌情,马上钻入洞中。^⑮如河北定县第20高小授课时注重隐蔽,并在房上、树上广设瞭望哨;或让民众坐在门口劳作,一旦有敌情,立即发暗号,指示学童躲避。该校还提出“一人一堡垒”口号,开挖地下堡垒,进行隐蔽教学,共挖掘153个地下堡垒。^⑯

总的来说,游击小学、两面小学、隐蔽小学均坚持抗日教育,与抗日小学并无二致,实乃抗日小学因地制宜的产物,三者各有适用地区。巩固区基本由中共控制,但仍不时遭遇日伪“蚕食”与“伪化”教育渗透,故“反伪化”教育多以“敌伪来时即转移”的“游

击教学”为主。游击区长期存在中共与日伪间的争夺,遭遇日伪袭击破坏较多,故除“游击教学”外,还实施“表面亲日,实际抗日”的“两面教学”,二者一动一静,有机配合。敌占区基本受日伪控制,但因中共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也开辟了部分“反伪化”阵地,以“隐蔽教育”为主。需注意的是,上述内容仅为一般性归纳,实际斗争情况极为复杂。依敌我势力对比等因素,上述模式在不同区域均有分布。实际上,“两面教学”“隐蔽教学”实为“游击教学”的变体,三者常结合使用。有的学校,低年级因以识字为主,故学伪课本;中年级备两套课本,平时学抗日课本,敌人来时摆上伪课本;高年级则以隐蔽教学、分散教学方式,学抗日课本。^⑰这有利于减轻日伪对敌后小学的袭扰和控制,保证敌后抗战教育的正常进行。

面对日伪怀柔与威压并举的政治控制手段,中共在强化抵制措施的同时,也加大政治争取工作的力度。针对日伪的“集中小学”措施,中共号召坚决抵制。各小学多采取软磨办法,拖延不送儿童就学。如遭敌人武力威胁,则选派一批政治可靠的儿童暂时应付。^⑱待其归来后,进行“消毒”以祛除“敌人的奴化教育”。^⑲或将计就计,让学生到“集中小学”就学,伺机侦察日伪岗楼据点内部情况。^⑳针对日伪的威逼利诱,中共给予儿童“应敌教育”,教其应付日伪盘问。如日伪发现学校,则拒不承认自己是学生;如日伪已发觉学生身份,则只承认有算术、识字课程,绝不承认有抗日、国语、政治等课程;生人打听学校时,也要否认有学校存在。^㉑中共还在学童中开展“五不运动”,即“不告诉敌人一句实话”,“不报告干部和八路军”,“不报告地洞和粮食”,“不要敌人东西,不上敌人当”,“不上敌人学,不参加敌人少年团”。^㉒

针对日伪对教员的整肃训导,中共严令禁止教员到日伪控制区受训,或有计划地派人参加,受训归来后加以适当教育。^㉓与此同时,从党政民各部门抽调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从事教育工作,使党员在小学教员中的占比达到1/3或1/5,促进正面引导教育。^㉔中共还设立小学教员救国会^㉕,意在培育教员的抗战爱国热情。一旦发现教员的“(抗战)认识程度”有“低下或不足者”,一律取消教员资格,强令参加“进修训

练”。^⑧另外,对教员实施检定,检定标准有政治认识、文化程度、教学能力、思想意识,凡有违犯抗战行为者,剥夺其检定资格。^⑨甚至还向日军控制的据点学校派遣教员,私下进行抗日教育。^⑩日军评价称,中共训练教员,使其掌握了“在日军占领区适应民族革命(工作实施)的教育方法”,“巧妙穿插抗日理念,推进指导教育”。^⑪

中共还积极争取并改造“中间小学”^⑫,联络伪小学,使其转向拥护抗战。中共有计划地领导和组织“中间小学”,使其“里红外白”,表面应付敌人,实际实施抗战教育。对伪小学,则在打击的同时加强政治争取,尤其注意争取和掌握伪教员。或派遣抗日教员打入伪小学,或教育争取伪小学个别教员从事抗日教学与宣传工作。^⑬有的地方以通信谈话、介绍读物等方式团结伪小学教员,使其倾向抗战,逐步改造伪小学。^⑭工作推进中颇注重方式方法,如该教员是本地人,则经由其家属亲戚搞通关系,叫出来个别谈话教育,或让其到根据地参加教员训练班。如是外地人,则调查其家乡出身,找出来谈话。如不易争取,则设法撤换掉,换上抗日教员。^⑮伪小学学童也是争取的重要对象,中共常请伪小学学童轮流来抗日隐蔽小学上课,揭穿日伪“奴化”教育的本质。^⑯同时,以抗日小学学童教育伪小学学童,如先晓之以理,感化伪小学学童,再让其每日向抗日小学学童报告上课内容,由后者对内容进行批判,如不明白就问抗日小学教员,后再告诉伪小学学童。^⑰中共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教育伪小学学童,使其支持并加入抗日斗争,并将伪小学逐步改造成表面效忠日伪、实际宣传抗日思想的两面小学。中共要求,需“利用敌方学校,发展己方教育工作”,并揭露敌方的“欺瞒阴谋”,“发挥教育的战斗性”。^⑱

三、小学“反伪化”斗争的成果

在斗争实践中,完善教育系统、开展灵活教学、加强政治争取三者相辅相成,统一于小学“反伪化”工作。其中,完善教育系统提供物质基础,灵活教学维护工作安全,政治争取保证人力供给,三者确保了“反伪化”斗争取得丰硕成果。

完善教育系统建立起“反伪化”斗争的坚强工作机制。其中,重建校舍与狠抓师资等措施使遭到日

军破坏的学校机构得以初步恢复,为“反伪化”斗争的开展奠定了物质与人才基础。同时,在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后,中共亦建成以“中心小学”为核心的学校管理机制,实现了教育工作的“一盘棋”,为集中力量实施“反伪化”斗争提供了良好的支撑。

灵活教学使抗日小学教育免受日伪的冲击破坏,抗日教育得以安全有序进行。在游击教学模式下,小学授课不拘定式,学生自带板凳蒲墩,随地上课,一有敌情立即分散转移,小学日益成为“冲不垮的堡垒”。^⑲游击教学隐蔽性极佳,日伪慨叹束手无策。日伪虽持续发起“肃正”袭击行动,但敌后小学教育并未遭受较大破坏,即使部分情况下遭受一定打击,也可在短时期内恢复正常授课。一些学校经“扫荡”后,原需两个月才可复课,后来只需一周甚至2—3天。^⑳两面教学与隐蔽教学亦极大降低了小学遭受日伪袭扰与破坏的风险。如定县第20高小隐蔽教学工作严密,日伪曾在一天内反复搜查15遍均无果,该校开挖的地下堡垒亦多次躲过敌伪搜查“清剿”。^㉑

政治争取使伪小学学童与教员归心抗日事业,很多“中间小学”和伪小学逐渐接受中共领导,成为抗日两面小学,抗日小学数量不断增多。如晋察冀边区48个县内1938年接受中共领导的小学有4898所,1940年增至7697所,1941年又增至8000所以上;1938年中共领导的小学有学童22万460人,1940年增至46万9416人。^㉒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伪小学数、学童数则持续减少。如在1943年初—1944年初,冀中区第十专区8个县的“抗日隐蔽小学”“抗日两面小学”和“敌伪小学”的数量和就学人数发生了极大变化。(见表1)“集中小学”学生寥寥无几,特务教员成了“空军司令”。^㉓中共掌握的小学学生及学校数量不断增加,中共教育的“渗透势力日益扩大”。^㉔日军称,中共小学就学儿童数逐年增加,“表明彼等工作进度进展之一面”。^㉕

抗日教育使学童免遭日伪“亲日教育”的蒙骗,认清了日军的侵略者本质,培育和激发了学童的坚定政治立场与浓烈爱国热情。在与日伪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极大支援了敌后抗战活动。如被砍断手指却宁死不屈的王

禾、温三玉,被烧得皮焦肉烂却仍不吐一字的张六子。^⑭学童抗日情绪高涨,对日军侵略行径怀有强烈的反抗意志,时人有言“晋察冀游击区的孩子不会哭”^⑮。日军称,“小学儿童抗日意识短时期内异常旺盛……村内儿童皆对皇军士兵面露极具敌意眼神……对民族战争之自觉认识已相当彻底”^⑯，“极度厌恶日本人”可视为“儿童思想教育发挥之效果”。^⑰

学童政治觉悟大大提高,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动员工作。一是动员儿童参加儿童团。华北抗日根据地儿童团员数在1940年已达60万人。^⑱二是动员儿童到抗日小学就学。晋察冀边区1943年春展开入学“突击周”“突击月”活动,因儿童组织严密、号召力强,大大提高了当地学童入学率。如阜平县八区入学率达86%,完县南峪村达96%,平山县28个村达80%,井陘县洪河村则全员入学。^⑲三是动员学童家属参与抗敌斗争。实践证明,村干部无法说服的人,有时竟被小孩感动了;许多别人动员不了的家长,常被自己孩子动员出来。^⑳在学童影响下,教员也点燃爱国热情,“不再关起门来教书,知道关心与群众运动”,“配合与联系战争、生产救灾的斗争”。^㉑学童发挥了“密切联结”大众与救亡运动的“媒介”作用。^㉒

学童还广泛参与社会教育工作。他们常在村中冬学内充任教员或“小先生”^㉓,或者组成识字组,自己任组长,“即知即传人”,将所学知识传授给民众;若遇不认识的字,则先到小学把字认识,再去教民众。^㉔“小先生”亦有集体、个别两类,前者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后者赴各家教习识字,或父母弟妹,或亲友乡邻,有的“小先生”还找3—10个年龄相仿的儿童做自己的学生。^㉕学童还自创各式教育方法,如设立识字牌,教来往行人或聚集闲谈的民众认字。^㉖日军称,识字班、小学等启蒙文化活动“最简明直接地开辟了抗日与‘赤化’之道路”^㉗,中共“教化工作”对

群众抗日意识的影响“不容乐观”。^㉘

学童还积极参与抗敌宣传活动。各中心小学组织儿童宣传队,在周边设立板报,内容有抗日新闻、漫画、街头诗、歌曲、标语等。^㉙小学中的儿童团亦常结成宣传队、合唱团宣传抗战思想,还参与当地民众组织的救亡运动集会。^㉚有的地方还组成歌咏队、秧歌队、剧团演出,宣传生产、时事、拥军等抗日政策,写春耕标语。^㉛学童成为“宣传队”,广大小学构成“宣传网”,如“敌情变化,参军参战……除奸防特等中心工作”都经此迅速地宣传到千家万户。^㉜

学童抗敌意志高昂,积极投身抗日一线。有的地区组建儿童优抗队,帮助抗属生产、送饭、抬水,麦收时亦组队帮助抗属收割;有的地区组成儿童纠察队,负责站岗放哨、查路条;还有的地区则广泛参与战时宣传,空室清野,协助运输、护送伤兵等工作。^㉝日军也承认,学童参与各种救亡团体,对救亡工作“抱有相当热烈的情绪,努力加以实干”。^㉞部分学童经受“保护干部教育”,还参与了掩护保护干部的工作。如干部来村,则自动找其接洽,协助隐蔽;如来村之事被日伪发觉,则以群众面目谎称干部为亲戚,将其藏匿。定县第20高小两年间共营救247名县级干部。^㉟学童的应敌技能得到强化,使干部行动更有保障。

学童甚至还参与了地下工作。如面对日伪强要学生,定县第20高小挑选优秀学生,施以短期训练,嘱其如何应付日伪教员,团结争取伪小学学生。到校不久,适逢伪青少年团改选,学生们竟当选主要职位,夺取了领导权。他们暗自行动,很快将抗日宣传品送入日伪内部。^㊱日军称,“志愿从事密探活动之少年布满各处”。^㊲部分学童接受过反情报培训,积极参与除奸防特。晋察冀边区完县、唐县、曲阳县学童抗战五年间共拿获汉奸90人、汉奸嫌疑犯432

表1

冀中区第十专区8个县小学数与就学人数

时间	抗日隐蔽小学		抗日两面小学		敌伪小学	
	小学数	就学人数	小学数	就学人数	小学数	就学人数
1943年2月	132	830	220	2667	3355	
1943年9月	251	3090	368	8850	237	2662
1944年初	422	21050	482	15570	90	1956

资料来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册·回忆录选编》,第221、224页。

人。^⑮不少教员也参与战时情报传递工作,甚至直接参加战斗,接敌侦察,主动袭击敌人。^⑯日军称,中共“灌输抗日民族意识一事,可谓令人不寒而栗。尤其今日小学学童背弃青年支那(理想),对其成长期待愈大,此感可谓愈深”。^⑰

四、结语

小学“伪化”活动是抗战相持阶段后日军“治安强化运动”在文化教育上的重要措施。^⑱日军先后采取军事破坏、思想洗脑、政治控制等手段,妄图将学童培养成日本侵略者的顺民。为粉碎日军图谋,中共先后采取完善教育系统、灵活教学、政治争取等措施,从而拉开了“伪化”与“反伪化”斗争的序幕。

在抗敌实践中,中共认识到,“没有文化教育思想斗争的地区,则武装或政权斗争的胜利,长期坚持也就没有保证”。^⑲故中共尽力将“反伪化”与游击战相结合,尤其注重汲取游击战术精髓,运用到“反伪化”斗争中,使“反伪化”融入而成为敌后游击战争的有力补充。这让小学教育工作的性质从“抗战教育”上升为“教育抗战”。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华北根据地创造了“游击教育”的“奇迹”。^⑳

需注意的是,“反伪化”斗争的胜利亦得益于许多因素,主要有二:一是教育体制改革为“反伪化”提供了组织支撑。为提升根据地小学教育质量,中共实施了小学教育体制改革。以山东为例,其具体措施有改革学制、改编教材、设立抗日小学,改良私塾、强制使用抗日教材,改善教员待遇、培养师资,筹措教育经费。^㉑上述措施有利于恢复并改善小学教育体制,支援“反伪化”斗争的实施。不过,除改编使用教材、设立抗日小学外,其他措施均与“反伪化”措施相异,故教育体制改革与“反伪化”有重大区别。“反伪化”的本质是政治动员,意在动员、争取学童教员,以实现对其的掌握与领导。新建管理机制意在加大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力度,新编抗日教材意图强化思想教育,使学童与教员投身抗战活动,灵活教学则意在降低上课遭日伪军事偷袭的风险,维护抗敌教育的正常进行。三者均统一于旨在加强对学童教员掌握的目标。二是生产互助运动夯实了“反伪化”的经济和群众基础。抗战爆发后,根据地军民利用旧有劳动互助形式,进一步动员组织,广泛开展生产互

助运动。这使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粮食等重要物资丰产,助力经济的平稳运行,为“反伪化”的开展提供了物质保证。同时,生产互助亦促成民间生产联合体的发展,以经济纽带实现民众经济动员,为推进“反伪化”等政治文化动员奠定了群众基础。此外,生产互助中积累的“劳武结合”组织经验,即“战争准备与春耕准备合一,武装组织与劳动组织的合一,特别要加强村与村的情报联络工作,作到轮流保卫与突击”^㉒,亦为“反伪化”中将游击战术融入教学工作提供了启发。

对中共而言,“反伪化”斗争成功地争取到学童对革命事业的支持,有利于党的抗日思想传播到一般群众。以学童为先导,牵动其家长,可使更多群众投身抗日事业。此外,因“伪化”与“反伪化”斗争的主战场是游击区与敌占区,故“反伪化”斗争的胜利更可瓦解日伪的统治基础,并与军事游击战相配合,推动敌后抗日斗争的发展。学童是新生力量,学童的支持也使中共革命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更具生命力、战斗力。经受“反伪化”等一系列革命斗争的洗礼,中共也积累了丰富的组织动员群众的经验,收获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日军称,中共“小学工作”旨在“提升(文化)常识与(推进)未来建设”,现已“收获相当的效果”。^㉓中共“实施共产教育训练,逐次争取儿童、青壮年、妇女阶层中有共产主义理论基础之民众,谋划扩大共产区域”,“谋划通过教育,逐次……争取民众,扩张势力”,“实现冀中地区的赤化”。^㉔群众的坚定支持为日后中共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注释:

①抗战时,华北敌后战场可大体分为中共控制的巩固区、日伪控制的敌占区、中共与日伪争夺的游击区。小学的“伪化”与“反伪化”斗争主要发生在敌占区与游击区。

②相关研究成果有居寅:《晋察冀边区中小学教育初探》,《河北学刊》1985年第1期;曹剑英:《晋察冀边区教育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张建民:《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反奴化教育》,《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7年第9期。

③相关研究成果有何德廷:《抗战时期杂牌军的待遇及其伪化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刘茗:《晋察冀边区教

育史稿》，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谢洁菱、周蒋浒：《抗战期间日伪在沦陷区的奴化和伪化教育——以南京地区作个案分析》，《巢湖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何德廷、辜宗秀：《杂牌军伪化探源》，《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④相关研究成果有申国昌：《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小学教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3期；王显成：《北京市伪政权对中小学的奴化教育》，《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7期；徐志民：《战时日本对华奴化教育决策研究》，载臧运祜等主编：《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有关史料及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396页；王飞朋：《山东日伪政权奴化教育研究(1937—1945)》，山东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李常宝：《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小学教育研究》，《安徽史学》2018年第5期；黄彩霞：《“不拿武器”的侵略：日本对华“宣抚工作”与“宣抚文学”研究刍议》，《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李常宝：《抗战期间中共太行根据地小学教员生存样态探微——以襄垣县为中心》，《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张汉静、王鹏飞：《抗战初期山西晋北地区侵华日军宣抚班研究》，《史志学刊》2019年第5期；翟意安：《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华“宣抚班”(1937—1940年)述论》，《青海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张汉静、王鹏飞：《侵华日军宣抚班“教化”活动研究——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史志学刊》2021年第1期；王萌：《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宣抚班及其“宣抚”工作》，《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1年第3期；王萌：《谋心：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宣抚工作(1937—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⑤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战争时期》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页。

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29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⑦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0100、
『治安工作境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⑧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74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1703000、
『北支情報記録関係書類』、昭和13—14年。

⑩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93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⑪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86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⑫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88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⑬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00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⑭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57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⑮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13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⑯新教育学会编：《解放区群众教育建设的道路》，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122、134页。

⑰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抗日政权工作七项五年总结(1937.7—1942.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233、238页。

⑱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79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⑲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31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⑳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83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㉑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4800、
『治安工作境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㉒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2700、
『治安工作境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㉓中共延庆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延庆人民革命史(1937—1949)》，内部资料，1988年，第13页；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92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㉔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98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㉕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8600、
『治安工作境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㉖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08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㉗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76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㉘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73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㉙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69页。

㉚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5700、
『治安工作境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㉛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45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㉜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8400、

『治安工作經驗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③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3500、

『治安工作經驗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④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2900、

『治安工作經驗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⑤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9300、

『治安工作經驗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0100、

『治安工作經驗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⑦中共河北省党委党史研究室、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抗日政权工作五项五年总结(1937.7—1942.5)》，第238页。

⑧《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编：《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5期至第8期》，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5700、

『治安工作經驗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⑩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4600、

『治安工作經驗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6000、『治安工作經驗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⑪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8300、

『治安工作經驗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⑫中共延庆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延庆人民革命史(1937—1949)》，第13页。

⑬《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册·回忆录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32页。

⑭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8800、

『治安工作經驗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⑮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1400、

『治安工作經驗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档案馆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5页。

⑰新教育学会编：《解放区群众教育建设的道路》，第122页。

⑱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9100、

『治安工作經驗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⑲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0800、

『治安工作經驗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⑳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1300、

『治安工作經驗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㉑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8500、

『治安工作經驗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㉒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7400、

『治安工作經驗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㉓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5300、

『治安工作經驗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㉔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0845000、

『陸支受大日記』、第25号、昭和14年5月18日—5月19日。

㉕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1400、

『治安工作經驗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㉖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0800、

『治安工作經驗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㉗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6—97页。

㉘新教育学会编：《解放区群众教育建设的道路》，第122页。

㉙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0800、

『治安工作經驗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㉚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1194000、

『陸支受大日記』、第46号(5/5)、昭和14年。

㉛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3031901900、

『中国共産党運動の解説』、「森川史料」。

㉜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3031901900、

『中国共産党運動の解説』、「森川史料」。

㉝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329页。

㉞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战争时期》上册，第118页。

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战争时期》上册，第108页。

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328页。

㊲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15页。

㊳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20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14页。

㊴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2567100、

『陸支密大日記』、第40号(3/3)、昭和15年。

㊵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2567100、

『陸支密大日記』、第40号(3/3)、昭和15年。

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1672300、

『方参特報綴』、第2号(1/3)、昭和14年2月—14年3月。

- ②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1669200、
『方参特報綴』、昭和14年1月。
- ③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1672300、
『方参特報綴』、第2号(1/3)、昭和14年2月—14年3月。
- ④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2566800、
『陸支密大日記』、第40号(3/3)、昭和15年。
- ⑤董纯才:《解放区教育建设的道路》,《北方文化》第7期,1946年6月。
- ⑥樊润德、路敦荣主编:《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第2集,内部资料,1983年,第212—213页。
- ⑦“小先生制”原为教育家陶行知于20世纪30年代初创立,后中共加以借鉴学习。
- ⑧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战争时期》上册,第162页。
- ⑨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第170—171页。
- 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332页。
- ⑪新儒:《冀中区的教育工作》,《新华日报》1942年11月27日第3版。
- ⑫新儒:《冀中区的教育工作》,《新华日报》1942年11月27日第3版。
- ⑬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0650600、
『支受大日記』、其6、73册の内、昭和13年11月29日—12月3日。
- ⑭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2567100、
『陸支密大日記』、第40号(3/3)、昭和15年。
- ⑮新教育学会编:《解放区群众教育建设的道路》,第126—127页。
- ⑯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20卷,第657页。
- 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战争时期》上册,第155页。
- ⑱新教育学会编:《解放区群众教育建设的道路》,第127页。
- ⑲《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审编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册·回忆录选编》,第221页。
- ⑳新教育学会编:《解放区群众教育建设的道路》,第129页。
- ㉑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第172页。
- ㉒《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审编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册·回忆录选编》,第632页。
- ㉓新教育学会编:《解放区群众教育建设的道路》,第135页。
- ㉔《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审编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册·回忆录选编》,第632页。
- ㉕新教育学会编:《解放区群众教育建设的道路》,第137页。
- ㉖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第174—175页。
- ㉗新教育学会编:《解放区群众教育建设的道路》,第132页。
- ㉘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抗日政权工作七项五年总结(1937.7—1942.5)》,第214页。
- ㉙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 ㉚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战争时期》上册,第119页。
- ㉛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1672300、
『方参特報綴』、第2号(1/3)、昭和14年2月—14年3月。
- ㉜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9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页。
- ㉝《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审编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册·回忆录选编》,第632页。
- ㉞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2568400、
『陸支密大日記』、第40号(3/3)、昭和15年。
- 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战争时期》下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03页。
- ㊱董纯才等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2卷,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9页。
- ㊲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战争时期》下册,第404页。
- ㊳新教育学会编:《解放区群众教育建设的道路》,第135、136页。
- ㊴新教育学会编:《解放区群众教育建设的道路》,第136页。
- ㊵《人民教育》社编:《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片断》,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
- 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2567100、
『陸支密大日記』、第40号(3/3)、昭和15年。
- ㊷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20卷,第644页;《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审编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册·回忆录选编》,第212页。
- ㊸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战争时期》上册,第173页。
- ㊹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第172—173页。
- ㊺张向一:《边区小学教育的概况》,《晋察冀日报》1943年1月23日第4版。

- ①⑥新教育学会编:《解放区群众教育建设的道路》,第135页。
- ①⑦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2567100、
『陸支密大日記』,第40号(3/3)、昭和15年。
- ①⑧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945900、
『北支那方面軍戦時月報資料』、(付図)3月分、昭和16年4月15日。
- ①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册·回忆录选编》,第99、100页。
- ②⑩新教育学会编:《解放区群众教育建设的道路》,第139页。
- ②⑪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1194200、
『陸支受大日記』,第46号(5/5)、昭和14年。
- ②⑫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2568300、
『陸支密大日記』,第40号(3/3)、昭和15年。
- ②⑬团中央少先队工作委员会、中国少年先锋队工作学会编著:《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话》,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页。
- ②⑭团中央少先队工作委员会、中国少年先锋队工作学会编著:《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话》,第132页。
- ②⑮中共河北省党史研究室、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抗日政权工作七项五年总结(1937.7—1942.5)》,第204页。
- ②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战争时期》上册,第179页。
- ②⑰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1672400、
『方参特報綴』,第2号(1/3)、昭和14年2月—14年3月。
- ②⑱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20卷,第654页。
- ②⑲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战争时期》下册,第8、9页。
- ③⑩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抗战书店1940年版,第209页。
- ③⑪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9卷,第250页。
- ③⑫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1490400、
『北支那方面軍昭和16年度肅正建設計画』、昭和16年2月26日—16年4月10日。
- ③⑬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1703100、
『北支情報記録関係書類』、昭和13—14年。
- ③⑭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2567100、
『陸支密大日記』,第40号(3/3)、昭和15年。
- ③⑮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1672300、
『方参特報綴』,第2号(1/3)、昭和14年2月—14年3月。
- ③⑯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77页;樊润德、路敦荣主编:《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第2集,第214页。
- ③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册·回忆录选编》,第214页。
- ③⑱樊润德、路敦荣主编:《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第2集,第212、214页;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5卷,第376页。
- ③⑲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1672300、
『方参特報綴』,第2号(1/3)、昭和14年2月—14年3月。
- ④⑩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第175页。
- ④⑪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第176页。
- ④⑫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2568300、
『陸支密大日記』,第40号(3/3)、昭和15年。
- ④⑬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第185页。
- ④⑭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战争时期》上册,第179、180页。
- ④⑮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1194000、
『陸支受大日記』,第46号(5/5)、昭和14年。
- ④⑯中央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治安强化运动》,第75页。
- ④⑰中共河北省党史研究室、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抗日政权工作七项五年总结(1937.7—1942.5)》,第216页。
- ④⑱陈桂生:《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页。
- ④⑲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合编:《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1辑·综合类1》,内部资料,1985年,第12—13页。
- ⑤⑩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 ⑤⑪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2568300、
『陸支密大日記』,第40号(3/3)、昭和15年。
- ⑤⑫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2568400、
『陸支密大日記』,第40号(3/3)、昭和15年。